

关于理解 and 解释问题研讨综述

叶 泽 雄

解释学的兴起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因其对人的理性的重新审视与评判、注重人文社会现象研究的视角转换和方法更新以及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积极探讨而被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着当代西方哲学演化态势的一种占主导性地位的哲学思潮。其基本思想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代人多元的开放心态,因而愈来愈受到人们的普遍瞩目与关注。然而,在解释学理论的嬗变过程中,象理解和解释这样的解释学的中心概念,不仅在不同的学者那里用法不一,甚至在同一学者那里往往亦因时而异,含糊不清。由此引发出一系列值得人们思索与探究的哲学问题。为此,武汉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博士生指导小组的部分师生就理解和解释问题展开了研讨^{*}。现将讨论中的一些基本观点综述如下。

一、解释学的兴起及其内在发展逻辑

在谈到解释学兴起的问题时,博士生导师欧阳康教授指出:直观地看,解释学的兴起始发于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作为相对独立学科的可能性的关注和对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特殊关注,是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深层地看,实际上根源于对人文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在本体论和价值论意义上的联系和区别以及由此而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在人类历史上,对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长期落后于对自然的认识。对自然的认识率先从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中独立出来成为科学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科学由此而成为人类知识发展的神圣目标和绝对标准。任何其他门类和方面的知识,其是否发展及其发展的水平如何,均要看其是否符合科学化的方向及所达到的科学度水平,要看其是否符合自然科学意义的科学标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实证主义强调人文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的相似性。相应地,强调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思路和方法上的共通性,要在科学一体化的观念支配下以实证主义方式肯定人文社会科学的可能性,强调把人文社会科学建设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硬科学”。与此相反,解释学(尤其狄尔泰)则立足于人文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在本体论和价值论意义上的根本区别,而否定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相互沟通和借鉴的可能性,

^{*} 参加本次研讨的人有:欧阳康教授、汪信砚教授、朱传启教授、肖中舟副教授,博士生姚军毅、肖诗美、袁银传、倪素香、刘远传、叶泽雄、郑文先等。

把理解看作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根本的方法。注意到人文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本质区别并由此而关注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独特性,是解释学兴起的根据和意义。

博士生郑文先认为,解释学的兴起及其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渗透,既与如何恢复被工具主义文明淹没了的人的精神价值密切相关,又与如何说明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以及如何实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统一的问题紧密相联。同时,语言分析在当代哲学中的发展,也成为推动解释学迅速崛起和发展的重要触媒。

博士生刘远传说,当代解释学的兴起,尽管其理论还存在着不少缺陷,但它对于认识论尤其是人文科学研究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简要地说,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开创性地探索人文科学认识的特殊性。第二,扩展了认识论研究的时空领域。第三,使认识论研究由主客体的二元分裂状态走向相关统一。第四,揭示了认识过程的复杂性。

解释学不仅有其产生的客观必然性,而且有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对此欧阳康教授指出:综观解释学的历史发展,直接地看,主要是围绕理解和解释这对概念来展开的;深层地看,实际上涉及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否存在统一性以及统一的基础何在来展开的。狄尔泰把理解与解释对立起来,实际上是把人文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与自然科学方法论绝对对立起来,这就否定了二者之间相互沟通、统一借鉴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些人(如亨普尔)强调解释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同样具有重要地位,认为理解只是提供与动机假说有关、与心理学分析相关的协助方法,要求以解释为基点来统一理解,寻求解释基础上的理解。这实际上是寻求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统一性。另一些人(如伽达默尔,利科尔)强调理解和解释的同等重要性,提出“文本”作为理解的基础,强调理解过程中的“视界融合”,以此在精神科学的基础上寻求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统一性。在这种意义上,只有抓住对科学统一性及其基础问题,才能把握解释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线索。

二、现代解释学向我们提出的主要问题

就现代解释学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欧阳康教授简要地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 在本体论意义上,人文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之间到底是怎样实际地相互联系和相互区别的,世界的内在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到底是怎样实际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解答是回答其他全部问题的本体论前提和基础。2. 在价值论意义上,自然现象与人文社会现象的价值特性有哪些根本联系和区别,它们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与价值有哪些实际的影响,并怎样导致这不同学科的实际分化,这是深入研究的价值论基础。3. 在认识论意义上,人文社会现象及其规律是否可以被认识以及如何认识,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理解与解释是否绝对对立?如何标示出人文社会认识与自然认识之间的共通性与区别性?利科尔的文本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客体概念、客观概念之间的关系如何?能否在对客体概念的文本化解释或在文本概念的客体化理解中找到二者之间沟通与过渡的桥梁?如何说明不同文本之间的差异性及其对理解模式和解释模式的影响?4. 在方法论意义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之间是否存在着在方法论上相互沟通和彼此借鉴的可能性?建立与当代大科学体系相适应的大科学方法论体系是否可能?其实现途径如何?

三、理解和解释问题研究中的几个难点问题

1. 理解和解释概念的各自内涵及其关系 欧阳康：人文社会现象的理解是否需要解释或说明，自然现象的解释或说明是否需要理解？如何在二者之间保持张力，寻求统一？

郑文先：解释和理解是解释学的中心范畴，对这两个范畴的含义的不同说明，意味着遵循不同的解释学道路。解释（interpretation），又称释义或翻译，意指以一种语言形式传达对象的意义。理解意指领会、了解（understanding）。在狄尔泰那里，理解与说明相应，前者是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方法，后者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说明，是对那些与说明者（人）自身不同的现象的把握，它要求建立普遍有效的说明模式；而理解则不同，它以承认某人进入他人精神生活的原始能力为前提，“理解”即对人的理解。有了对作者意图的精神体验，我们才能正确解释作者创作的文本的意义。从西方解释学各代表人物对解释和理解的使用来看，其区别和联系表现在：（1）“解释”往往指释义的全过程的一个特定时刻和实现机制，而“理解”往往指释义的前提和结果。从语义上看，“理解”本来就是与“误解”相对立的。（2）“解释”注重释义的客观方面和客观效应，“理解”则注重释义的主观方面和主观效应。理解作为“了解”、“领会”，突出了人的心理接受的方面。（3）“解释”强调了所把握对象的事实性及把握方式的描述性；而“理解”强调的是把握对象的价值方面及把握方式的体验性。

2. 理解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欧阳康：人文社会内部的文化差异与文化隔阂是相互理解的障碍，而人类文化的内在共通性和整体性则使相互理解成为可能。理解的客观基础和主体性条件是什么？利科尔的文本概念能否保证理解的客观性？

倪素香：传统解释学将客体的自在性作为理解的前提，认为可以通过理性超越主观的经验而达到对历史的客观性认识。当代解释学在对传统解释学的批判转向中，认为理解活动中的基本关系是主体间的关系，解释者与文本之间不是主客体关系，而是一种参与的关系，是解释者与文本创造者之间的对话，其客观性就表现在主体间的有效性。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直接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展示理解对人的存在的意义，将解释学改造为本体论哲学，这无疑有其合理性，但由此带来对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缺乏关注，导致对理解客体性超越的同时又抹杀了对象的客观存在。利科尔等人开始注重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建设，但其对客观性的确定认为就是文本自身，对客观性的内容和实质还缺乏全面的论证。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首先肯定文本作为认识对象是客观存在，在一定限度内主体与客体是有界限的。其次，文本的内容不论是真实还是片面的，都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有其客观内容。在强调理解的主体性的同时，不能忽视理解的客观性的一面。

3. 理解的个体性与整体性 欧阳康：理解与理解者的特殊历史经验、现实状况和未来追求相联系，具有绝然的个体性，但如果仅有个体性又如何能够保证理解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呢？相互理解和对理解的理解都需要依托于彼此间的文化共通性。如何在个体性与整体性之间保持张力，寻求统一？

4. 理解的相对性与绝对性 欧阳康：在特定的场境中，只有真正被对方承认为理解才能算作理解。伽达默尔的“对话”就是验证理解的一种方式。这是对理解的绝对性的一种追求，但能达到直接对话的场境是有限的，还有许多比这要复杂得多的超时空的理解。这时如何检

验和证明理解及其程度?如何走出理解中的相对主义?

叶泽雄:在我看来,理解的绝对性是指,理解总是对某个东西的理解,它或是人们常说的客体、对象、人,或是“文本”。但无论称谓什么,人们在理解之前,事实上已经承认或假定了它的优先地位和客观存在,并力图通过一定的方式去把握其真实的内容。从解释学的角度看,解释者对“文本”的个体性的多元化理解,也总是或多或少与文本的原意和蕴意相关。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解释学(如狄尔泰)要求主体忘却自己,进入历史的“视野”,恢复作品的“原意”的思想有其天然的合理性成分。而理解的相对性是说,对同一个文本,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这是因为理解者所处的环境,理解活动的对象、理解的历史性存在以及由历史铸就的“先见”等规定和制约着理解者的理解域。从现实上看,理解不是消极地复制出“文本”,文本的先在性与时空间距使得解释者与文本、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当代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人们期望不断消解这种张力,但又不能完全消除。从这方面讲,无声无息的“文本”具有向人们无限敞开和开放的可能性。哲学解释学(尤其是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提出理解的形式是历史的视野与解释者主体的视野的溶合。解释者与被解释对象之间的张力只有在这两个视野的溶化中才能被暂时地克服。显然,伽达默尔的“视界溶合”思想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且与传统解释学相比更具合理性。事实证明,解释者总是站在自己的时代,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人们总是为了指向和服务于未来而关注历史,因而对历史的研究,对文本的理解,一方面表现出人想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什么,另一方面又表明人对已逝的历史的不满足或心理上的某种匮乏。正是这种矛盾决定着人的理解的超越和开放的本性。理解是符合与超越、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

欧阳康教授就以上问题最后强调说,理解和解释研究中的难点问题只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得到解决。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从实践中以及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实践的介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西方现代解释学的固有定式,理解和解释及其派生的许多疑问和难题只能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获得“普遍有效的客观性基础”,并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问题只是在于我们如何着手深化在这方面的研究。

四、解释学对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的重要启示

解释学对人文社会现象、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关注以及对理解和解释中的诸方面问题的分析,无疑给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当代社会认识论的深入研究以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叶泽雄认为,自然认识的对象是外在于人的,人们可以采取主——客二分的模式,通过观察、实验等手段来实现对它的认识,并以定量化、可重复性、可检验性来保证其科学性。社会认识的对象则有所不同。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研究的对象是人、人的活动或人的活动的产物。社会领域的人不仅具有意识性、目的性和语言性,而且人与人之间互为主客体。社会现象和事件并不具备自然科学意义的重复性、可检验性,社会科学的规律也很难用严格的数量关系来描述。很显然,社会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别于自然认识的,把“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当作普适模式搬到社会认识领域是否行之有效?这是深入社会认识论研究必须注意和重新思考的问题。

自然认识和社会认识对象的不尽一致,导致对对象把握的方式和方法上的差异和区别。由于社会历史的活动是人的活动,包含着人的精神因素于其中,按照解释学的观点,人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社会历史及其活动当作一篇文本来阅读。但是这种阅读究竟是什么?是一种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认识、解释或说明,还是一种仅渗透着人文因素的理解,或两者兼而有之?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自然认识与社会认识在其思路和方法上是否绝对对立或二者之间有其共通性和互补性?如此等等。这些都是今后社会认识论不得不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郑文先指出,就西方解释学提出的问题来看,他们关注人的存在和人的价值,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特性质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在新的更高层次上的整合,这些都是人类实践生活和科学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关注的问题。解释学从哲学解释学开始,注重从人的生存方式去揭示、阐释一系列哲学问题,这一哲学视野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有某些相合之处。近年来,解释学有逐渐向马克思主义接近的势头,解释和理解问题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社会认识论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首先,深化对社会认识论性质和目标的认识。社会认识论是对社会认识的认识,是认识论的一个分支学科。其对象是社会认识,区别于自然认识;其任务是促进社会认识达到科学化。解释学给社会认识论的启示在于:对社会的认识不仅要注意同自然认识的同一性,借鉴、移植自然科学方法去把握社会,又要注意社会认识同自然认识的差异性,注意社会历史事件的自身的独特性和人文价值要素决定了社会认识必须拥有同自然科学方法相区分的、适合于社会历史事件特点的认识方法。在我看来,强调理解方法的重要性,是建构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就是要在理解与说明的张力关系中寻求促使社会认识达到科学化的途径。与此相关,社会认识论对于促进社会认识科学化的理解不同于自然认识论对自然认识达到科学化的理解。后一种“科学”的概念主要是在与对象相符合的真理性意义上使用的;而前一种“科学”概念除了真理性之外,更强调其价值性和人文性。

其次,深化对社会认识形式的认识。社会认识是在认识与评价相互交织的形式中展开的。那么,如何更加全面地、准确而具体地揭示这一社会认识的实现形式,是当前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个人认为,解释学关于解释过程是说明与理解既相对立又相和解的观点对解开这一谜底有重要启迪。

再次,破除“主客二分”的既有认识论模式,又更新社会认识论的研究范式。在社会认识论的初期研究阶段,沿袭了长期坚持的“主客二分”模式。把社会认识者作为主体,而把社会认识对象作为客体,社会认识过程就是社会认识主体运用必要的方法或中介去把握社会客体的过程。当代解释学给我们的启示是:社会认识对象不能简单理解为被动的客体,它是有着自主性并保持着意义开放性特征的“文本”。阅读者或社会认识者不能把自己的主观意图强加于“文本”之上,解释过程或认识过程只能是阅读者或社会认识者与“文本”的相互作用过程,它包含着说明又包含着理解,是说明与理解的对立与和解的辩证统一过程。因此,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应当在张扬人性、凸现人文价值的总目标下,沿着既与绝对主义、客观主义划清界限又与心理主义划清界限的更为健康更为合理的轨道前进。